

# 儒家经典《十三经》编集过程述略

□周春健

所谓“十三经”，是指儒家学派尊奉的十三部经典著作，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经的编成，经历了一个从六经到五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的长期的不断丰满的过程。

先秦时期，儒家经典只有六部，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时称“六经”，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六经之名，始于《庄子·天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从战国到西汉武帝时，六经通常被称为“六艺”，其意是指六种教学科目，如《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关于六经的排列次序，从汉代起一直有不同的意见。今文经学家按六种学科内容程度由浅入深的顺序排列，即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古文经学家则按六经产生年代由早到晚的顺序排列，则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一般说来，今文经学所讲的六经次序，比较符合先秦时期儒家学派使用这六种典籍的实际情况。

先秦时的六经流传到西汉前，保存下来的只有五经。西汉初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篇中还是六经经名并称，但到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已无《乐》经博士，表明此时《乐》经已经失传。另一方面，“五经博士”的设置，意味着儒学正式成为官学，《诗》《书》《礼》《易》《春秋》成为最高统治者钦定的经典，享有崇高的地位。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原来的五经内容已不能满足思想统治的需要，经的领域开始扩大，至东汉而有“七经”之说。七经之名，始见于《三国志·秦宓传》：“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但七经的具体所指并未说明。一般说来，东汉通行的七经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孝经》。相对于过去的五经而言，增加了

《论语》《孝经》二经。

《论语》起初并不是“经”，而是作为对“经”进行进一步阐述的“传”。战国及汉初时，《论语》的地位也并不高。汉文帝时，将《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立于学官，设“传记博士”。武帝后，《论语》地位逐渐提高，这与汉代统治思想的转变有直接的关系。汉初，统治者为缓和阶级矛盾，推崇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武帝即位以后，为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消除诸侯割据势力，开始积极扶植和发展儒学。儒家学者代表董仲舒提倡“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谶纬神学，这一学说需要树立一个精神上的偶像，于是选中了儒家学派的祖师孔子，尊之为“素王”。在这一情势下，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至东汉而升格为经。

《孝经》全文不足两千字，是十三经中篇幅最短的一部，大概成书于战国末年至汉代初年。汉代统治者重视“孝道”，提倡“以孝治天下”，以更好地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皇权世袭制度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东汉统治者将《孝经》规定为自幼学习的经籍，而且仍托它的作者就是至圣先师孔子。待《论语》《孝经》学通后，再来研习其余五经。

唐朝初年，太宗锐意经术，命儒臣孔颖达等撰著《五经正义》，为五经制定了标准的注释和义疏，完成了经学的统一。唐代以科举取士，“明经”科中考《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加上《周易》《尚书》《诗经》《孝经》三经，“五经”扩大成了“九经”。

“六经”“五经”以及“七经”中的“礼”，指的是《仪礼》十七篇，它是周代礼仪制度的汇编，记述了古代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项具体礼仪，在“三礼”中成书时间最早。《周礼》又名《周官》，是一部讲政治制度的书，通过记述各种职官的名称及职务，展开对社会政治制度的构想，大概成书于战国末期。《礼记》则是战国到秦汉间儒家礼学论文的汇编，是阐发礼的作用和意义的一部典籍。唐初颁定《五经正义》，“礼”书所取为《礼记》，但《礼记》毕竟成于汉人之手，不能取代原来的“礼”经；而且固然《仪礼》中的具体仪式有些过时，但《周官》

中的官制、政制等对于唐代社会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于是政府规定“三礼”都作为经书来学习并作为考试科目。

《春秋》一经，原为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孔子以《春秋》教学，由孔门弟子记述下来，从而成为儒家经典。《春秋》篇幅短小，言辞简约，有诸家为之作“传”，其中流传于世的有左丘明所作的《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所作的《春秋公羊传》和谷梁赤所作的《春秋谷梁传》，史称“春秋三传”。

至于曾经列为“七经”的《论语》和《孝经》二经为何未被列入“九经”，一方面，唐代初年，孔子的地位不如在汉代那么高，唐太宗尽管也锐意经术，但他更为推崇佛道偶像如来佛和太上老君。孔子相对被冷落，《论语》自然也就不是人人必须诵读的经书了。而唐太宗乃由杀兄逼父而得皇位，违背封建孝悌观念；武则天废太子，当女皇，扰乱父系制，又与封建宗法制格格不入，这均与《孝经》所提倡的“孝道”相背离，因此这一时期就不再提倡《孝经》了。另一方面，《论语》《孝经》虽然不在“九经”之列，但却属“明经”各科所必须兼通的，因此它们实际上还是“经”。

唐朝后期，出现了“十二经”之说，乃是有了“九经”之外，又增加了《论语》《孝经》和《尔雅》三经。

唐中期以后，佛教之风盛行。佛教宣扬出世思想，宣扬“无父无君”，这给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和封建专制政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儒家学说却可以起到维护封建伦理关系，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于是儒学重又受到重视，孔子又成为思想权威，《论语》也重新成为“经”。

唐玄宗李隆基消灭韦氏统治集团，恢复李氏天下，使统治阶级进一步认识到“以孝治天下”对于稳定天下、巩固政权的作用，于是《孝经》重又被推崇。玄宗还亲自到太学宣讲《孝经》，并为之作注，天下之人趋之若鹜。唐玄宗的《孝经注》传布天下，后由宋人收入《十三经注疏》中，通行至今。

至于《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书，也是第一部大致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编纂而成的词典，内容十分丰富，具有百科

全书的性质，大概成书于战国末期。“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所谓“尔雅”，就是指用当时作为规范的雅正之言，解释当时已经认为是时代较远难以通晓的古籍中的词语。清人宋翔凤在《尔雅郭注义疏序》中称其为“训故之渊海，五经之梯航”。当初唐太宗下令编纂《五经正义》，就是为了实现《五经》在文字、训诂、义疏方面的统一，为国家考试和教学提供一个标准范本。如今的经典，已由初唐的“五经”扩展到“九经”，后又扩展到“十一经”，新增的经典同样面临一个训诂要求统一的问题。既然作为“五经”的“传”（春秋三传）、“记”（礼记）、“论”（论语）都已成为经书，那么作为阅读经传必须翻检的《尔雅》也正可以作为诸经训诂的共同依据而收到统一之效，于是《尔雅》升格为“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于长安国子监门前立石，刻成十二经，作为士子传习和参加科考的定本，史称“开成石经”。十二经的次序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

到了宋代，唐代的“十二经”，再加上《孟子》，便成为流传至今的“十三经”。《孟子》一书原来并不是“经”，而是“子”，《孟子》由“子”升格为“经”，是中国经学史的重要事件，也最终促成了“十三经”的编成。

孟子之学在战国后期形成势力强大的孟子学派，但秦始皇焚书坑儒，烧孟派之书，杀孟派之儒，孟学遭受重创。汉初，由于统治者的需要，孟子及其书又受到重视，汉文帝时即曾与《论语》《孝经》《尔雅》一道，立“《孟子》博士”，总称“传记博士”。但总的来说地位尚不足以与后世相比，比如《汉书·艺文志》列《论语》于“六艺类”，而列《孟子》于“子部·儒家类”，《孟子》地位显然不及《论语》，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唐代，到了宋代发生了变化。按照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一书中的说法，《孟子》的升格运动主要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滥觞”于唐代的韩愈、李翱。



韩愈在《原道》中首次提出儒家的“道统”，首次以“孔孟”并称取代了传统的“周孔”及唐初以来的“周颜”并称，学生李翱维护之，《孟子》一书开始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

2.“初兴”于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与石介。孙复曾云：“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为首，故其功钜。”二人学术影响甚大，于是出现了一股“尊孟”热潮。

3.“勃兴”于程洛学、张载关学及王安石新学。二程极力推崇孟子，曾称：“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于子思，子思传之于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为首，故其功钜。”二人学术影响甚大，于是出现了“十二经”“十三经”之说。

4.“完成”于南宋的朱熹与陆九渊。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结为《四书》，获得崇高而稳固的地位，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几百年。至于陆九渊，尽管与朱熹学术观点、治学路数不合，但在尊孟上并无二致，王阳明即称：“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至此，宣告了《孟子》由“子”到“经”升格运动的完成，以后的目录著作也纷纷将其列入

“经部”，孟子也于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加封为“亚圣”。

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合刻注疏本“十三经”问世，这是首部关于经学“十三经”的丛书。这部丛书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都曾刊行过，清代乾隆年间又有武英殿聚珍本，且又刻经文于石，立之太学。至经师阮元，又据宋本主持校刻重刊，并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这个本子就是现在的通行本。

中国传统经典领域的扩大，至“十三经”而止。尽管也有人提出“十四经”或“二十一经”之说，但都未能流行开来。“十三经”的编成，经历了一个流传演变和不断扩充的过程。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每一历史阶段对儒家经典都经历了一个审慎的选择。最后确定下来的这十三部经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对于中国古代史和儒家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学术价值。“十三经”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深刻而久远。

**作者简介：**周春健，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2025年1月24日/星期五/文化副刊部主编/责编 易芝娜 / 美编 李金宝 / 校对 黎松青

## 晚会·潮人新知 A7

灶神还是发明火的炎帝？是休妻的“渣男”？还可能曾是女人？

# “小年”为啥要祭“灶王爷”

□清洁工（南开大学博士生）

每年腊月廿三或廿四，是中国传统的“小年”。这一天的风俗是祭祀灶神。

不知你有没有琢磨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家明明有很多家具，比如碗、筷、锅、盆、床、桌、椅、空调、冰箱、热水器、马桶、扫帚、洗衣机……为啥不祭灯神，不祭手机神，不祭寒冬腊月里可爱的暖气、空调、电热毯之神，却非得年复一年地巴结“灶神”呢？

**来源 男女皆有不简单**

年画上的灶神只是一位眼神单纯、白胖子，但他其实可以算是中国古代神话体系里来历最复杂的神仙之一。

古人对“灶”的祭祀起源于先秦典籍中的“五祀”“七祀”。这种风俗流传了两三千，古书里沉淀的关于“灶神”的来源说法太多了。

西汉典籍《淮南子·泛论训》对于祭祀有一段很有人情味的描写，说那时的人会祭祀灶台、门板、扫帚之类的东西，算是对这些终日辛劳的用具表达感恩。人们也会感恩那些造福人类的先人，比如炎帝发明了火，所以人们要在生火做饭的灶台上边祭祀炎帝——炎帝可能就是最早的“灶神”。

东汉学者应劭著《风俗通义》卷八《祀典·灶神》则引用“周礼”说的说法，称：“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因为人们认为祝融是“火神”，也即“灶神”。

灶台除了生火，还要做饭。自古在灶台边辛苦劳作的人常是女性，所以古人想象的灶神也往往是女的。比如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中说，有人认为“灶神是祭老妇，报先炊之义也”。“先炊”指发明烹饪术的人，这里说她是一位老奶奶。《庄子·外篇·达生》也记载，“灶有髻”。陆德明《经典释文》引用晋人司马彪的话说：“髻，灶神，着赤衣，状如美女。”这里说她是穿着火红衣服的美丽女神，后被封为“灶神”。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黄丕烈校本《夷坚志》书影

还有人把灶神看作“炊神”，也有人把灶神看作主掌一家吉凶祸福之神。在古代，后者这种有特权的角色一般都是男的。于是，灶神的形象越来越男性化，有人说他叫苏吉利，有人说他叫张单，还有人说灶神本来是“陈氏老母”，“修行千载神通大，留下宝火度凡人”，最后“王帝亲口重封赠”“女子封为男人相”，“升格”成了男人。

这些灶神典故里，最流行的当属“张郎休妻”传说。这个传说在各地有不同变体，大体而论，故事里的灶神本来是一个男青年，在大多数版本中姓张。有研究猜想这可能与一个叫张角的人有关。他离开结发妻子出门赶考或者经商，取得名利后，翻脸不认人，休掉妻子另攀高枝。结果世事变幻，几年后，男人沦为乞丐，偶尔敲开一家大门行乞，却发现开门的女士正是自己当年的妻子。那女子不念旧恶，照样请他吃喝。男人最后羞愧地冲进灶台，撞死了自己，立马杀了黄羊祭祀灶神，后来果然发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刘源生影写宋本《淮南子》书影

汉武帝却还执迷不悟，一直不承认李少君是个大骗子。

灶神集荣华富贵于一身。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卷八《祀典·灶神》上说，东汉权贵氏族的祖先阴子方在某年腊日（腊日是当时一个重要的节日，可以算是腊八节和小年的“共同祖先”）做早饭，做到一半突然看到灶神显灵了。阴子方家有头黄羊，他立马杀了黄羊祭祀灶神，后来果然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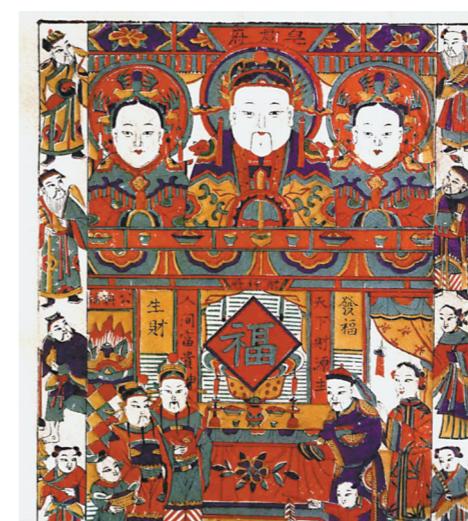
了大财。富庶几代后，阴家还官运亨通，一度成为东汉最显赫的大家族之一。

灶神主保人口平安。阴家的故事流传开以后，腊日用黄羊祀灶就成了一种风俗。但人人都在祭灶，该穷的还是那么穷，渐渐地，就有人觉得“升官发财”这个目标还是太遥远了，要不改成求平安吧。宋代洪迈编《夷坚丁志》卷二十《杨氏灶神》说，有一家姓杨，特别有钱。有一年冬天，杨家爸爸和儿子吵架，儿子小杨被赶出家门，只好跑到存干草的库房里过夜。库房没暖气，儿子冷得睡不着，正躺在哆嗦呢，突然钻进来一头大老虎，后面还跟着几个伥鬼。小杨赤手空拳打虎，心里那叫一个苦。突然间，又冒出来一位神仙救了他。那就是杨家的灶神。灶神赶走老虎，还把“摸鱼”不管老虎的土地神敲出来骂了一通才离开。

灶神不只记功还记过。传说中，灶神最核心的工作就是记录功过，尤其是记过。东汉后期的大学者郑玄说灶神：“小神居人之间，司察小过，而遣告者尔。”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说得更细：“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月晦日”就是月底最后一天。灶神每月上一次天，汇总人的错误：你犯个大错，扣你三百天的寿命；犯个小错，也要减你三天阳寿。

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四说得更吓人了：“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三百日。小者夺算。算者，一百日。故为天帝督使，下为地精。”

这些“纪”“算”具体都指什么呢？《大上感应篇》里列了一个超长的过错名单，其中固然有“杀人取财”“弃法受赂”之类放哪都说不过去的坏事，但也颇多类似于“在月底、年底唱歌跳舞”，或者“趁夜时裸奔”之类令人看来通常觉得不值一提的小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算的净是这种“小过”。若真如此，灶神每月算一次，三扣两扣，也难怪古人平均寿命这么短。



清代山东潍县的灶君图。画面中间的是灶神和他的一对妻妾，两边是“八仙”，下边是屋主一家迎接怀抱元宝的财神。

图片来自《中国民间美术全集·绘画卷》，吉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

## 祭法 调糖对酒且高歌

传说中灶神定的规矩实在太多，连古人都常常受不了。前面提到，从汉朝开始，人们常用黄羊祀灶。后来《四民月令》《荆楚岁时记》等重要古籍中，也提到用大米、大雁、猪来祭灶的。到了唐朝，人们开始用酒糟涂抹灶门，称为“醉司命”。“司”是掌管的意思，“司命”是掌管命运（尤指寿命）之神，此处指的应该就是灶神了。只要灶神喝醉了，小黑本上的字就看不清了，也就没法记过了。

宋人吴自牧《梦粱录》卷六又说：“二十四日，不以穷富，皆备（蔬食）饧豆祀灶。”“饧”读xǐng，指麦芽或谷芽糖，非常黏，可以粘住灶神的嘴，这小心思也是一目了然。

至于祭灶的时间，前引《抱朴子》《酉阳杂俎》等文献中已经说到，当时的灶神每月上一回天，所以每个月都要祭灶巴结。

宋代以后，带有佛教色彩的“腊八节”和更加古老的“小年”（在古代也叫“小岁”“小节夜”）瓜分了古老的“腊日节”，祭灶活动也固定在了“小年”。“小年”最初定在“腊祭”以后的第一天（比如南朝把腊日定在腊月初八，小年就是腊月初九）。宋代以后，“小年”又挪至过年之前一周左右。其实全国各地过“小年”的日期不太统一，从腊月廿三到廿五都有。有人甚至总结出一些类似“北三南四”或者“官三民四”的规律，但反倒也同多样。